

廖平說《春秋》「築王姬之館于外」之意論

許子濱*

一、前言

劉師培曾以八個字概括廖平的學術專長，即「長於《春秋》，善說禮制」。¹現在研究廖平經學的人，通常都會引用這句話。但據蒙文通所言，廖平的「獨造之學」，在於「會通三《傳》」以明《春秋》。他不但曉然於今古禮制之辨，更嘗試擺脫今古學的局限，直探孔子之學。因此，蒙文通說：「其（廖平）發明兩漢學之功，人知之；其破棄今古，直入周秦，人未有能知者。」²廖平以《穀梁傳》的禮制為主，《左傳》及《公羊傳》為輔³，將三者融會貫通，藉以闡發《春秋》的意蘊。在《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》、《公羊春秋經傳驗推補證》、《春秋左氏古經說義疏》、《春秋三傳折中》裏⁴，廖平曾借具體事例反覆申明此意。上列數書，計其成書年代，從 1884

*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

¹ 見蒙文通〈井研廖師與漢代今古文學〉引，載廖幼平編《廖季平年譜》（成都：巴蜀，1985），頁 173。李耀仙指出，劉氏說廖平「長於《春秋》」，指他在一、二變時期內所作《穀梁春秋古義疏》、《公羊春秋補證》和《左傳漢義補證》等書；「善說禮制」，指他在一變時期所作的《今古學考》，以禮制分別今古。見《廖平學術論著選集（一）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89），頁 19。實際上，廖平之學，在於以禮制明《春秋》。

² 見《廖季平年譜》，頁 173。

³ 據廖平《今古學考》，《穀梁》所說禮制全同〈王制〉，不似《公羊》之時參古學，而《左傳》亦雜用今學。詳廖平《今古學考》〈《公羊》改今從古、《左傳》改古從今表〉及〈經話〉。見《廖平 蒙文通卷》（石家莊：河北教育，1996），頁 29、60。

⁴ 據廖幼平所製〈六譯先生已刻未刻各書目錄表〉，《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》成書於光緒十年（1884），先後於光緒廿六年（1900）〈凡例〉寫於己亥光緒 25 年，1899）、民國十三年（1926）、民國十九年（1930）刊刻；《公羊春秋經傳驗推補證》成於光緒廿九年（1903），刊刻於三十二年（1906）；《春秋左氏古經說義疏》成於光緒三十四年（1908），刊於民國四年（1915）；《春秋三傳折中》成於民國六年（1917），刊於民國十年（1921）。本文所據《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》為渭南嚴式誨於 1932 年刊入《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》本。張預光緒癸巳（光緒十九年，1893）〈敘〉謂此書：「十易稟，未為定本」。廖平於癸巳三月所撰〈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自敘〉敘述此書之撰著過程云：「辛巳（光緒 7 年，1881）中春，痛微言之久隕，傷絕學之不競，發憤自矢，首纂遺說，間就傳例推比解之。癸未（光緒 9 年，1883），計偕都門，舟車南北，冥心潛索，得素王二伯諸大義。甲申（光緒 10 年，1884）初秋，偶讀

年一直到 1917 年，歷三十多年。其間，廖平經學經過五變⁵，但會通三《傳》之意，卻始終不變。⁶

廖平〈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凡例〉其中兩則云：

《左氏》、《公羊》與《傳》同說一經，不須求異。唯漢以後，久已別行，今既別解《公羊》、《左氏》，三《傳》各立門戶，不取苟同，務就本《傳》立說。然義本相同，後來誤解，因致歧出者，則必化其畛域，以期宏通。

三《傳》言禮制者，每《傳》多各言一隅，必須合考三家，方成完說。許、鄭訐爭皆失此旨。今于三《傳》禮制異同處，據參差互見諸例以說之，務使彼此相發，互文見義，合于禮意為主，不敢輕事杵擊，動成齟齬。⁷

後來《公羊春秋經傳驗推補證》亦云：

按：三《傳》禮多異，而以外言在外猶不可，在內則更不可言，異同互見，先師各執一解，則失經傳本意。如本《傳》于外為非禮，《左傳》為外禮也，說者因歧而異之。攷《穀梁》云則備二傳之文，始知解傳，當得言外之意，不可拘于文字，舉此一經立例，其餘皆仿此。⁸

廖平認為，三《傳》傳禮，各言一隅，必須互相發明，會通其義，方成完說。而在《春秋》所記諸事中，以《穀梁》所說「築王姬之館于外」之意最能體現其義例之所在，所以廖平就

〈王制〉，悅有頓悟，於是向之疑者盡釋，而信者愈堅，蒙翳一新，豁然自達，乃取舊藁重錄之。戊子（光緒 14 年，1888）詮釋《公羊》，繼有刪補。庚寅（光緒 16 年，1890）纂述《左氏》。癸巳讀禮多暇，取舊藁重加修訂。雖在會通三傳，而魯學家法不敢稍踰。又，舊藁至今十年矣，所說多不同，非大有出入，不悉削之，以存入門之迹。」以上引文見《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》，馬小梅主編《國學集要第二編》（台北：文海，1967），第 12 冊，頁 1-10。

⁵ 廖平經學六變的年代，第五變終於 1921 年，詳參黃開國〈廖平的經學六變及意義〉，載《經學今詮四編》（《中國哲學》第二十五輯），頁 606。

⁶ 李耀仙〈《廖平選集》（下冊）內容評介〉云：「《春秋三傳折中》序文中說：『自漢至今者，喜言其異，不言其同，雖馬季常有《三傳異同說》一書，而異者自異，同者自同，初未敢于不同之中以求同也。』他的看法是『《三傳》同繫一源，必于不同中以求同，斯為可貴。』他就是在這一思想的支配下寫成這部書的。書刊行于 1917 年，已進入其經學五變即人天之學的時期，猶戀戀不忘其在二變時期所許諾也。」見《梅堂述儒》（成都：四川大學，2005），頁 386。實際上，廖平會通三《傳》之意，始見於一變時期。

⁷ 見《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》，馬小梅主編《國學集要二編》，第 12 冊，頁 11、13。

⁸ 見《六譯館叢書》（四川存古書局刊，1921 年），第 3 冊，卷三，頁 3b。

借此事立例。本文所論，旨在評論廖平之說，以就正於大雅方家。

二、廖平說《春秋》「築王姬之館于外」之意

《春秋》莊公元年記周王嫁女於齊、魯為之主婚之事云：「夏，單伯送王姬。秋，築王姬之館于外。」冬十月後，「王姬歸於齊」。對「築王姬之館于外」一事，三《傳》之說詳略不同，《左傳》云：

築王姬之館于外，為外，禮也。

《公羊傳》云：

何以書？譏。何譏爾？築之，禮也。於外，非禮也。于外何以非禮？築于外，非禮也。其築之何以禮？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。主王姬者則曷為必為之改築？於路寢則不可，小寢則嫌，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。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。

《穀梁傳》亦云：

築，禮也；于外，非禮也。築之為禮何也？主王姬者，必自公門出，於廟則已尊，於寢則已卑。為之築，節矣。築之外，變之正也。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？仇讎之人，非所以接婚姻也；衰麻，非所以接弁冕也。其不言齊侯之來逆，何也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。

廖平對《春秋》所記築王姬館於外最為措意，從《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》，到《公羊春秋經傳驗推補證》，再到《春秋三傳折中》都一直借此事「會通三《傳》」發明《春秋》大義。而諸書所說，詳略不同，合觀之，然後能見廖說之全貌。

《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》：（大字為《穀梁傳》原文，小字為廖平注文。）

「秋築王姬之館于外。于外，當地不地，而曰外，非外也。非外而曰外，諱與齊為禮。外王姬不受邪命也。不言如，言于外，不言齊侯來逆，皆拒邪命。使魯若不與其事者然。」

「築，禮也。據本事，築于內。于外，據主昏不能在外築。非禮也。據變其實而託于外，知非典禮之正。築之為禮何也？據變以合正，諸侯館不須築也。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，公門謂廟寢

門。出，親迎出車。嫁于諸侯必受女于諸侯，禮也。諸侯嫁女大夫，則不出公門。於廟則已尊，禮，天子適諸侯，舍于廟，若在廟，則以天子禮待王姬，失之過尊，非禮也。於寢則已卑，寢，《公羊》作小寢，諸侯所居。諸侯嫁女於敵國，女自寢門出，親迎者于寢相授，若王姬於寢出，則禮如內女。天子女禮制異，以諸侯禮待之，過於卑，不可也。為之築，則不由廟寢出。節矣。班氏云：「改築必於城郭之內。」節，謂尊不嫌于天子，卑不嫌于內女，有節度也。（疏）按：以上同《公羊》。築之外，據失禮變宜得正。變之正也。《左傳》為外，禮也。變者，異於常禮，正謂得禮義也。（疏）魯莊忘仇，親與狩郎（引者按：當作郕），無緣此時能築於外，又有告廟親迎之禮，不能于野外行之。《春秋》因其失正，託言于外，使齊魯不相交接，若王姬過竟，魯備館舍者然。變接內之實事，以求報仇之正道。孔子曰：「因其事而加王心」，此之謂也。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？據變而得正，所變宜得禮。築外，失禮，故兼舉以為問。仇讐之人，非所以接婚姻也。衰麻，非所以接冠冕也。冠冕，諸侯冕而親迎也。（疏）當時築于內，莊親與齊侯相接行禮，仇讐為婚媾，衰麻對冠冕，大恥深惡，不可以言。王姬至魯外，當有館，因此託義，使若未嘗至國。言于外，所以避莊公與齊接也。按以上同《左氏》。《公羊》、《左氏》各言一節，《傳》乃全言之。凡三《傳》說禮不同者，多為此例。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。」⁹

《公羊春秋經傳驗推補證》於「築于外，非禮也」下注云：

按三《傳》禮多異，而以外言在外猶不可，在內則更不可言，異同互見，先師各執一解，則失經傳本意，如本《傳》于外為非禮，《左傳》為外禮也，說者因歧而異之。攷《穀梁》云則備二《傳》之文，始知解傳，當得言外之意，不可拘于文字，舉此一經立例，其餘皆仿此。¹⁰

《春秋三傳折中》於《左傳》文下云：

《公羊》于外非禮也，《穀梁》築之外變之正也，然實事築內，《春秋》變其實而託於外，外王姬，以外齊使，若未嘗至國，所以避莊公與齊接也。《公羊》與本《傳》各言一節，《穀梁》合之，乃全。本《傳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。即於外之說。¹¹

⁹ 見《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》，馬小梅主編《國學集要二編》，第12冊，頁176-178。

¹⁰ 見《六譯館叢書》，第3冊，卷三，頁3b。

¹¹ 見《六譯館叢書》，第48冊，頁20a。《春秋左氏古經說義疏》所說全同，見《六譯館叢書》，第49冊，卷三，頁1b。

評語又云：

按：《經》書築館于外，三《傳》異文。《左氏》謂于外為禮，《公羊》謂于外非禮，《穀梁》築之禮也，築之外，變之正也。先儒不得其解，於是各師一說，無敢求通。今考經例，外當地不地，非外也。莊公忘親事仇，實築於內，《春秋》變其實而託於外。外王姬，即以外齊侯，使若齊侯未嘗至國者然。《左氏》就仇齊言，故云於外為禮，所以避公與齊接也。《公羊》就主婚言，故云於外非禮，所以惡公輕王姬也。《穀梁》於外非禮，即《公羊》主婚之說；築之外變之正，即《左氏》仇齊之說。《公羊》、《左氏》各言一節，《穀梁》合之，其義始全。是此條三《傳》互異，而義則相通。說者當據此為準，不可一見異文遂求相反，則於經義斯為得矣。¹²

整合上列諸文，我們可以較完整地看到廖平對築王姬之館於外的想法。廖平的立論根本，就是認定《春秋》書「築王姬之館于外」寄寓著孔子的微言大義，以為這是孔子「因其事而加王心」的實例。「因其事而加王心」，這句話出自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·俞序》¹³，是公羊家說的孔子作《春秋》託事以明義的道理。廖平即以此為據敷演《春秋》之微言大義。按廖平之意，周王不顧齊襄公於魯莊公有殺父之仇，反使魯莊公為王姬主婚，故斥之為「邪命」。魯莊公亦忘殺父之仇，為王姬修建館舍於城郭之內，並與齊侯以吉禮相接。經文之所以說「于外」，既深為魯諱，亦帶有「外王姬不受邪命」之意。連帶「單伯逆王姬」言逆不言如¹⁴、僅書「王姬歸于齊」不言齊侯來迎，皆有堅拒邪命之意。實築於內，《春秋》變其實而託言於外，讓人看起來，好像是王姬過境，魯莊公只為她準備館舍，未嘗居中主事，未曾與仇人齊襄公相接行禮。這樣寫，不但可以深為魯諱，更帶有「以求報仇之道」的深意。觀乎此言，足見廖平所論，較《穀梁傳》所言更為深曲。《穀梁傳》不同於《公羊傳》之處，在於說「築之外，變之正也」，其意是說，魯既然為王姬主婚，依常禮，就當特地為她建造館舍。如今要與仇人親接，喪服又未除，魯莊公實在不宜為王姬主婚，於是就變經行權，把王姬館舍建造在城外。毋庸置疑的是，三《傳》解說，深淺曲直，或有不同，但都是按照魯莊公築館於外這個事實來闡明經義。廖平卻別出新解，以為《春秋》這句話用意更為深遠。今天看來，《穀梁傳》之說已頗為深曲，不免令人懷疑，而廖平更變本加厲，馳騁臆說，立說雖巧而終不可通。（說詳下文）

¹² 見《六譯館叢書》，第48卷，頁21a。

¹³ 見蘇輿《春秋繁露義證》（北京：中華，1992），頁159。

¹⁴ 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二傳經文均作「單伯逆王姬」，唯《左傳》「逆」作「送」。《公》、《穀》誤而《左傳》是。詳參毛奇齡《春秋簡書刊誤》，《清經解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88），冊1，頁680。

廖平所謂會通三《傳》，究其實質，無非以《穀梁傳》通釋《左傳》、《公羊傳》。他認為，在解說「築王姬之館于外」這件事上，《穀梁傳》的說法最得其正，《左傳》只看到築於外合禮之變一端，而《公羊傳》只知道當築於內的道理。在廖平前後，就有學者將《左傳》與《穀梁傳》牽合在一起，援引後者之意來詮釋前者。¹⁵追本溯源，在方法上，廖平是有所本的。我們知道，杜預、孔穎達曾批評漢儒賈逵、服虔廣引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以說《左傳》，自壞家法。¹⁶但對「築王姬之館于外」的解讀，杜預、孔穎達又何嘗不是如此。杜預注《春秋》「築王姬之館于外」云：「公在諒闇，慮齊侯當親迎，不忍便以禮接於廟，又不敢逆王命，故築舍於外。」杜氏這段注文大概就是櫟括《穀梁》之意而成，只是以「諒闇」變易《穀梁》的「衰麻」而已。假如結合孔穎達《疏》來看，此意更為明晰。孔《疏》云：「《穀梁傳》曰：『築之外，變之正也。仇讎之人，非所以接昏姻也。衰麻，非所以接弁冕也。』其意言公與齊為讎，又身有重服，不得與齊侯為禮，故築于外也。左氏先儒亦用此為說。杜案《傳》文，稱請以彭生除之，齊人雖為殺彭生，心實讎齊，但不敢逆王命，故以諒闇為辭，故築館于外。杜謂諸侯之喪，既葬則衰麻除矣，不得以喪服為言也。若讎不除、服未釋，則諸侯之國同姓多矣，天王不應強使魯侯冒斬衰接父讎與之行吉禮也。以此益明杜諒闇之言為得其實。徒以昏姻吉禮，行事在廟，公在諒闇之內，慮齊侯當來親迎，不可便以全吉之禮接賓於廟，又讎除服釋，不敢逆王命、辭主昏，故築舍於外，使齊侯從外迎之。」¹⁷孔《疏》贊成杜說，為之詮解，且謂杜改「衰麻」為「諒闇」更「得其實」。其時上距桓公之葬已有數月，如說莊公已除下喪服，應不成問題。莊公是否守心喪，則有待進一步探討。杜預又注《左傳》「秋築王姬之館于外，為外，禮也」云：「齊彊魯弱，又委罪於彭生，魯不能讎齊，然喪制未闕，故異其禮，得禮之變。」孔《疏》云：「《傳》不直言禮，而云為外禮者，築之是常，未足褒美，正為築之于外，是應變之禮，故解其意。齊彊魯弱，又委罪彭生，魯既不能讎齊，雖內實深讎，外若無怨，既不敢辭王命，又不欲見齊侯，因其喪制未闕，故異其禮，為之於外，是其得禮之變也。……王姬之館必築之者，《公羊傳》曰：『主王姬者，必為之改築，於路寢，則不可；小寢，則嫌；群公子之舍，則以卑矣。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。』《穀梁傳》曰：『廟，則已尊；於寢，則已卑。為之築，節矣。』《箴膏肓》云：『廟、朝廷，各有定處，無所館天子女，故宜築於宮外。』是言須築之意也。但杜意若其內不恨齊，非有喪制，不須築於城之外耳。此言外者，謂城之外。說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亦以為城外，然王姬來嫁必須築館，所以十一年王姬不築館

¹⁵ 劉文淇《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》（香港：香港太平書局，1966）便說：「左氏古誼本同於《穀梁》也。」（頁135）

¹⁶ 詳陳建樑〈服虔以《穀梁傳》解《左氏》例釋〉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，1994年第6期，頁10。

¹⁷ 見《十三經注疏·左傳疏》（臺北：藝文，1988），頁136。

者，或因其舊館，或築而不書也。」¹⁸細繹孔《疏》，知杜預實推衍《穀梁傳》而成。孔《疏》再結合二《傳》，把《左傳》的「為外」理解為築館於城外。總上所論，杜預、孔穎達以《公》、《穀》之意說《左傳》，是十分明顯的，這種做法對廖平不無影響。他們的說法，是否合乎《左傳》原意？這是下文接著要探討的問題。

三、「『于外』實在內而非外」論

廖平釋「于外」二字云：「于外，當地不地，而曰外，非外也，非外而曰外，諱與齊為禮。外王姬，不受邪命也。不言如，言于外，不言齊侯來逆，皆拒邪命，使魯若不與其事者然。」按《穀梁》所釋《春秋》書法，確有於外則地這個條例。《春秋》記桓公十八年「公薨于齊」及文公十四年「公孫敖卒于齊」二事，《穀梁》皆曰：「其地，於外也。」魯桓公和公孫敖或薨或卒于齊，皆在國境之外，故《春秋》特書其地。又，《春秋》宣公九年記「晉侯黑臀卒于扈」、襄公七年記鄭伯髡原「卒于操」，《穀梁》雖然也說：「其地，於外也」，但扈為晉邑、操為鄭地，皆在國境之內、國都之外，與前面兩事稍有不同。據上列《穀梁》錄地之例，明書其地，意味其地或在國境之外或在國都之外。廖平根據這個條例，並加以敷演說：「于外，當地不地，而曰外，非外也。」在廖平看來，依《穀梁》之意，凡于外必書地，如今不點明地名，就是內而不是外。也就是說，當時實築王姬之館於內。既築館於內，又與齊襄公相接，完成主婚之事。《春秋》故意寫「于外」，是出於隱諱的考慮。實在內而託言於外，就隱含著不受周王「邪命」之意。不特築館，《春秋》所記「夏，單伯逆王姬」，書「逆」不書「如」，冬十月「王姬歸于齊」，不明言齊侯來逆，同樣帶有不受「邪命」之意。凡此三事皆隱含著孔子的微言大義。孔子這樣曲筆書之，無非是深為魯諱，好像魯不曾參與其事一樣。

廖平認為，莊公主婚，按禮當告廟，而齊侯來迎，此等禮儀皆「不能于野外行之」。如此看來，廖平似把「于外」理解為於「野外」。

實際上，無論《左傳》、《公羊》，還是《穀梁》本文，都沒有提及「于外」的確切含意。仔細分析起來，在廖平的話裏，于外當地，實本《穀梁》傳例，但「當地不地而曰外，非外也」，就只能看作是廖平自己的推斷。而這個推斷不能視為《穀梁》的唯一解釋。我們也可以這樣理解《穀梁》之意：「于外」當地而不地，既毋須點明地名，則其地不在國都之外。

綜觀《春秋》及《左傳》所記，魯侯屢在國都以外的郊邑築臺，即以莊公為例，《春秋經》莊公三十一年載：「春，築臺于郎。」夏四月，又「築臺于薛。」秋，復「築臺于秦。」這三

¹⁸ 見《十三經注疏·左傳疏》，頁137。

次築臺，《左傳》皆無說。據楊伯峻所考，即為魯南郊之邑，薛、秦則未詳所在。¹⁹雖然如此，郎臺、薛臺、秦臺，均以邑名臺，我們有理由相信，這三個臺都不在魯國都之內，而是應該在魯郊邑或更遠處。《春秋》紀錄這三次築臺，均點明其地，合乎《穀梁》「其地，於外」的條例。《公羊傳》認為其中兩次（即築郎及築薛），都有譏刺之意。《公羊傳》云：「春，築臺于郎。何以書？譏。何譏爾？臨民之所漱浣也。」何休《注》云：「禮，天子有靈臺，以候天地，諸侯有時臺，以候四時。登高遠望，人情所樂，動而無益於民者，雖樂不為也。四方而高曰臺。」²⁰天子有靈臺，可以《詩·大雅·靈臺》為證。但從《左傳》所見，春秋之時，諸侯亦多有靈臺。至於「築臺于薛」，《公羊傳》云：「何以書？譏。何譏爾？遠也。」何休《注》：「禮，諸侯之觀不過郊。」若何休之說可信，薛臺就在郊之外了。魯文公十六年之泉臺，《公羊傳》以為與莊公所築之郎臺同實而異名，「未成為郎臺，既成為泉臺」，謂之泉臺，是因為下臨水泉的緣故。²¹綜合《春秋》所記莊公諸次築臺來看，臺前皆著邑名，其地大抵在魯國都之外近郊之處。尤當注意的是，莊公三次築臺，《春秋》屬辭，可與「築王姬之館于外」比照。以彼例此，築王姬之館僅說「于外」，而不繫以地名，適足以證明此館之所在，與諸次築臺於國都之外者不同。

至於廖平謂實築於內《春秋》變其實而託言于外，為魯深諱，尤為迂曲難通。《春秋》桓公元年書「鄭伯以璧假許田」，《穀梁傳》解釋書法云：「假不言以，言以非假也。非假而曰假，諱易地也。」廖平或據此義例而云然。倘如廖說，於「築王姬館于外」一事，《穀梁傳》理應有所闡發，今傳文但云：「于外，非禮也。……築之外，變之正也。」了無一言涉及隱諱之事。由此可見，廖說不必是《穀梁》之意。

四、「仇讎之人，非所以接婚姻也」論

廖平於「仇讎之人」下注：「齊侯也」；於「非所以接婚姻」下注：「魯主婚接，接內，謂齊侯來接公。」按《穀梁》、《公羊》所言婚制，齊侯必須親迎，如是則行禮之時，莊公親與齊侯相接。但按之當時實事，知其說不然。

緊接「秋，築王姬之館于外」之後，冬十月後，《春秋》續記「王姬歸于齊」。此處只說「王姬歸于齊」。杜預云：「無《傳》，不書逆，公不與接。」是齊襄公未為親迎。莊公十一年，周、齊再次聯婚，周王嫁女於齊桓公，莊公復為之主婚，《春秋》云：「冬，王姬歸于齊。」所記與元年事全同，但《左傳》明言「齊侯來逆共姬。」杜預謂齊襄公不親迎，即據此而言。

¹⁹ 見楊伯峻《春秋左傳注》（北京：中華，1990），頁248。

²⁰ 見陳立《公羊義疏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2），頁647。

²¹ 詳參陳立《公羊義疏》，頁647及頁1113。

考之《春秋》、《左傳》，當時諸侯婚禮，鮮見親迎之例。《春秋》莊公二十四年記「公如齊逆女」，《左傳》無說，《公羊傳》評云：「親迎，禮也」，《穀梁傳》亦云：「親迎，事也」。是《公》、《穀》二傳俱以諸侯親迎為常。但更多的事例證明，當時諸侯多不親自出境迎婦。也有學者以為，諸侯本當親迎，若有故，則使上卿逆之，後遂成常規。²²就《左傳》而言，諸侯娶婦，必使卿出境迎迓，然後為禮。如魯桓公三年娶婦，公子翬如齊逆女；宣公元年娶婦，公子遂如齊逆女；成公十四年娶婦，叔孫僑如如齊逆女；隱公二年，魯伯姬嫁於紀，紀使其卿裂繻來迎。故《左傳》於隱公二年發凡云：「卿為君逆」，於文公四年亦云：「逆婦姜於齊，卿不行，非禮也」。²³

春秋之時，周天子娶后或嫁女於諸侯，必以同姓諸侯擔任主婚人，按《春秋》所記，周桓王娶后于紀及嫁王姬于齊，均由魯侯主婚。正如毛奇齡《昏禮辨正》所考，昏禮以父為主。婿親迎之日，婦父當先設几筵於宗廟，然後拜迎于門外。²⁴綜合《春秋》經傳及其他文獻所述，魯除有親廟外，尚有文王廟、周公廟、太廟（即伯禽廟）、武公廟等²⁵，當時魯侯為王姬主婚，未知是否於文王或周公廟行禮。不過，令人疑惑的是：此時莊公才十二歲，如何能當王姬之父呢？是否他人代為主婚？亦未可知。如此看來，齊襄公既未必親迎，魯莊公亦難以親自主禮。況且，揆之情理，如魯人當時果有復讎之心，更難言齊侯有親迎之舉。廖平言之鑿鑿的莊公與齊侯相接之事，恐怕只是想當然罷了。

《穀梁傳》謂「仇讎之人，非所以接婚姻也」，似亦無據。我們知道，復讎是《公羊傳》及《穀梁傳》所標舉的《春秋》大義²⁶，二《傳》皆借桓公死於齊之事來彰明復讎之義。《春秋》書莊公四年「公及齊人狩于郕」，《穀梁傳》就說：「齊人者，齊侯也。其曰人，何也？卑公之敵，所以卑公也。何為卑公也？不復讎而怨不釋，刺釋怨也。」二十四年，「公如齊逆女」，《穀梁傳》以為莊公置國讎不顧，故《春秋》記其事，表明「不正其親迎於齊」。《公羊傳》亦多次提及《春秋》託莊公之事以明復讎之義，如狩于郕一事，《公羊傳》說：「齊侯則其稱人何？諱與讎狩也。」又，九年「及齊師戰于乾時，我師敗績。」《公羊傳》說《春秋》直書魯敗，為的是藉此張大復讎之義。事實上，《穀梁傳》、《公羊傳》根據經文闡釋《春秋》大義，不少地方都有問題，如說《春秋》不稱齊侯而稱齊人，即寓有深意，顯然與《春秋》記事習慣不符。《春秋》稱諸侯為人，大概有十餘例。²⁷《左傳》皆不以為貶，審其意，蓋將貶卿稱

²² 詳參季旭升〈《詩經》親迎禮辨〉，《中國學術年刊》，1985年第7期，頁6-10。

²³ 詳楊伯峻《春秋左傳注》，頁228。

²⁴ 說詳毛奇齡《昏禮辨正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冊95，頁10。

²⁵ 說詳章景明《殷周廟制論稿》（臺北：學海，1979），頁49。

²⁶ 據許慎《五經異義》所述，《周禮》舊師亦有復五世讎之說。詳黃永武《許慎之經學》（臺北：臺灣中華，1972），頁383。但《左傳》則未見此說。

²⁷ 吉本道雄〈春秋國人考〉說：「在《左傳》被確認為諸侯的，在《經》則被記作『國號+人』。這種

人與此分開處理。²⁸莊公四年「公及齊人狩於郕」，或是蒙上文「齊侯葬紀伯姬」而變稱人，未必帶有甚麼貶義。²⁹必須辯明的是，如果說莊公實有復讎之事，為何《春秋》、《左傳》沒有任何記載？就是說《春秋》託事明義，也不可從，許慎《五經異義》不是說：「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，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，《春秋》不譏。」³⁰傅隸樸《春秋三傳比義》考察過莊公即位後齊魯兩國的關係，也說：「三年春，『溺會齊師伐衛。』四年冬，『公及齊人狩於禚。』五年冬，『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。』八年夏，『師及齊師圍郕。』九年春，『公及齊大夫盟于訾。』都證明了公及齊國的合作關係之良好，到九年夏，公因納子糾而伐齊，才與齊成了仇敵，『八月庚申，及齊師戰于乾時，我師敗績。』『十年春王正月，公敗齊師于長勺。』」³¹即使兩國曾以兵戎相見，莊公二十四年還是親往齊國逆女，這又當何說？總之，《穀梁傳》謂築王姬館於外，是為了避免與仇人（齊襄公）相接，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。

五、「衰麻，非所以接冠冕也」論

《穀梁傳》謂莊公時在衰麻，不便換上吉禮之服，與穿著弁冕的齊襄公相接行禮。驗之春秋喪禮，可知此說實不可通。如上所述，杜預改《穀梁》「衰麻」為「諒闇」。「諒闇」涉及杜預主張的「短喪」之說，下文將對此說展開探討。

《左傳》昭公十五年云：

十二月，晉荀躒如周，葬穆后，籍談為介。既葬，除喪。以文伯宴，樽以魯壺。……籍談歸，以告叔向。叔向曰：「王其不終乎！吾聞之：『所樂必卒焉。』」今王樂憂，若卒以憂，不可謂終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，於是乎以喪賓宴，又求彝器，樂憂甚矣，且非禮也。彝器之求，嘉功之由，非由喪也。三年之喪，雖貴遂服，禮也。王雖弗遂，宴樂以早，亦非禮也。禮，王之大經也。一動而失二禮，無大經矣。

情況在宣公五年前有十二例。」見《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》[上古秦漢卷]（上海：上海古籍，1995），頁91。

²⁸ 見趙光賢〈《春秋》稱人釋義〉，載《古史考辨》（北京：北京師範大學，1987），頁128。當然，《左傳》謂稱卿為人即含貶意，亦不足信。

²⁹ 《春秋》稱諸侯為人，有蒙上變稱一例，詳陳槃庵《左氏春秋義例辨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93），頁323。吉本道雄〈春秋國人考〉不取杜預「告命記註」之說，以為把諸侯記為「國號+人」與稱卿為人一樣，皆帶有貶意。（《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》[上古秦漢卷]，頁123）其說未確。

³⁰ 詳參黃永武《許慎之經學》〈論復讎之義不過五世〉條，頁383-386。

³¹ 見《春秋三傳比義》（北京：中國友誼出版公司，1984），頁194。

隱公元年「弔生不及哀」及此處之「既葬，除喪」，杜預皆以「短喪說」予以注解。杜預提出「短喪」之說後，在當世就引起了不少爭論。杜說在唐代得到了不少的支持，短喪之風似乎還流行起來。孔穎達《疏》裏更為杜說做了不少補充說明。但到了宋代，「短喪」之說受到很多學者的批評，攻之最力者要算是司馬光。到清代的時候，杜氏之說更備受抨擊，有些人的措辭甚至極為激烈，如沈欽韓就說杜預「短喪」之說是「非聖無法，古今之罪人也」³²。後代禮家不取杜預「短喪」之說，故凡杜預視為「短喪」者皆以「受服」說之。

按照禮書的記載，古代喪服確實有「受服」之制，正如聶崇義《儀禮圖》所說，「受服」的制定，是因為：

凡喪，制服以表哀。哀有盛時殺時，其服乃隨哀隆殺。故初服麤惡，至葬後、練後、大祥後，漸細加飾。³³

據此，可知所謂「受服」，指喪服之重者，依葬、練、祥諸禮的舉行，逐次以輕服代替。禮緣人情而為之節文，哀有盛殺，因應情感的這種變化，喪服之質料也有所改變。而「漸細加飾」的標準，則以冠布的粗細為度，舉例如〈喪服·記〉云：

衰三升，三升有半。其冠六升。以其冠為受，受冠七升，齊衰四升，其冠七升。以其冠為受，受冠八升。

據此說，斬衰之升數有兩種，即三升及三升半。「以其冠為受」制定了受服升數的原則，一般來說，葬後，按照初喪時所服冠布的升數來受衰。此外，受服之「帶」，也與初服時不同。〈閒傳〉云：

既虞卒哭，去麻服葛，葛帶三重。

〈檀弓〉云：「婦人不葛帶」，則所謂「去麻服葛」者，指男子而言。男服重首，女服重腰。男子受服，改麻帶為葛帶，婦人受服，但除首絰，而麻帶則不變。有關服「受服」的時間，鄭玄〈喪服·注〉云：

³² 見沈欽韓《左傳補注》，《清經解續編》，冊3，頁23。

³³ 見《新定三禮圖》，《通志堂經解》（揚州：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93），冊11，頁518。

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，士卒哭，而受服。³⁴

胡培翬《正義》云：

案天子至士，皆於葬後，受以輕服。士卒哭與葬同月，天子諸侯卿大夫卒哭與葬異月，故大夫以上既虞受服也。³⁵

按〈士虞禮·記〉，士死後，三日而殯，三月而葬，遂卒哭，可見士禮中，虞及卒哭都在三月之後，故〈喪服〉云：「大功布衰裳，牡麻經，纓，布帶，三月，受以小功衰。」是士禮三月受服。然《左傳》所述天子至士之葬月，與禮書所載有異，據隱公元年《傳》的說法，天子七月而葬，諸侯五月，大夫三月，士踰月。然則在這種葬制下，士葬月內受服。考《春秋》所載，諸侯以三月或五月而葬為常，天子之葬月或許也不足七月之數。天子既然是葬後既虞始受服，這個時間可能就在始服後七月。如果此說能夠成立的話，據《左傳》所載，王太子壽之卒，在昭公十五年六月乙丑（即九日），而穆后崩日是同年秋八月戊寅（即二十二日）。周王「既葬除喪」在同年「十二月」，即使在十二月下旬，距穆后之死也不足四個月。那麼，以「受服」解釋「既葬除喪」為除重服就輕服，就不可信了。

清儒完全否定杜預提出的「短喪說」，於是另闢蹊徑，以「受服」解釋《左傳》所見的一些居喪除服的事例。平心而論，清儒的看法其實存在不少疑點。現在看來，「短喪」之說是否符合春秋實況，需要重新作出探討。杜預《注》解釋周王所失「二禮」云：

失二禮，謂既不遂服，又設宴樂。

他具體解釋這兩項內容說：

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，今王既葬而除，故議其不遂。

又說：

言今雖不能遂服，猶當靜默，而便宴樂，又失禮也。³⁶

³⁴ 見胡培翬《儀禮正義》（揚州：江蘇古籍，1993），頁1489。

³⁵ 見胡培翬《儀禮正義》，頁1490。

³⁶ 上引杜預《注》，見《十三經注疏·左傳疏》，頁825。

按照杜預的看法，叔向譏周王「不遂」，所謂「不遂」並非說不能終竟三年之喪，而是指不待卒哭而後除喪。王若除服，假使行「靜默（或信默）」之禮（這是杜氏對「諒闇」的解釋，詳下文），還算是合禮的做法。現在周王連靜默也不為，反而舉行宴樂，就失禮之極了。孔穎達闡發杜意云：

禮，葬日為虞，既虞之後，乃為卒哭之祭。〈喪服傳〉稱成服之後，晝夜哭無時，既虞之後，朝夕各一哭而已。卒哭者，謂卒此無時之哭，故鄭玄〈士喪禮注〉云：「卒哭，虞後祭名。始者，朝夕之間，哀至即哭，至此祭止，唯朝夕哭而已。」《傳》稱「既葬除喪」，譏王不遂其服。知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。今王既葬而除，故譏其不遂也。杜云「卒，止也。止哭。」與鄭不同。若如此言，除喪當在卒哭，而上下杜《注》多云「既葬除喪」者，以葬日即虞，虞即卒哭，卒哭去葬相去不遠，共在一月。葬是大禮，事書於經，故成君以否皆舉葬言之。……王不能遂服，乃與賓宴，又失禮也。以其喪服將終，早除猶可，宴事必不可也。襄十六年葬晉悼公，平公即位，會於溴梁。與諸侯宴於溫。又九年八月葬我小君穆姜，其年十二月，晉侯以公宴於河上，《傳》皆無譏，則卒哭之後得宴樂。³⁷

孔穎達指出，杜預《注》屢言天子諸侯「既葬除喪」，這裏卻說：「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」，前後文似乎不甚協調。孔氏為杜預解釋說：「以葬日即虞，虞即卒哭，卒哭去葬相去不遠，共在一月。」孔氏此說大概是根據杜氏的另一條《注》文，僖公二十三年《左傳》云：「卒哭而祔」，杜《注》云：「既葬反虞，則免喪，故曰卒哭。哭止也。」從這點可以看出，杜預認為不管是天子諸侯還是士庶，既葬反虞之後，就可以卒哭免喪，如是則天子諸侯跟士禮一樣，卒哭與葬同在一個月內。

杜氏之「短喪說」還見於隱公元年的《注》，《春秋》載那年秋天七月，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、仲子之贈，《左傳》解釋《春秋》書法時說：

緩，且子氏未薨，故名。天子七月而葬，同軌畢至；諸侯五月，同盟至；大夫三月，同位至；士踰月，外姻至。贈死不及尸，弔生不及哀，豫凶事，非禮也。

沈彤《春秋左傳小疏》坐實「贈死不及哀」中「哀」的具體時間，指出自始死至殯廟以及出

³⁷ 見《十三經注疏·左傳疏》，頁825。

殯至反哭這兩段時間，主人是最悲痛的。³⁸楊伯峻也沿用這種看法。據此，「哀」的下限大概就在既葬反哭之前。沈欽韓的說法則稍異，《左傳補注》云：

〈士喪禮〉下篇：「既窆，主人及弔賓弔者升自西階，曰：『如之何？』主人拜稽顙。」蓋前乎前，皆營死者之事，反而亡焉，失之矣，於是為甚，故弔之。《經》又云：「就次猶朝夕哭」，猶者，猶既殯之，朝夕哭也。〈喪服·疏〉云：「既殯以後，卒哭祭以前，阼階之下，為朝夕哭。」按：其時雖不代哭，其哀未殺，故為哭三無時之一也。《傳》文所謂「及哀」者，即是此時，以卒哭祭為限也。³⁹

沈欽韓以為「及哀」以「卒哭」為限，此說較近情理。大抵主人自親人初死開始，哀至則哭，哭無定時，即所謂「無時之哭」，可以盡情表達喪親之痛。禮的大原則是緣乎人情而為之節文，死者已矣，生人還要生存下去，不能一直沈滯於哀痛之中。所以，下葬之後，死者既然入土為安，主人隨即返回廟中，舉行反哭虞祭，再過些日子就行卒哭之禮。卒哭，也就是停止無時之哭，自此以後，只有朝夕哭。其哀痛之情比起以前，已有所減殺。因此，以「卒哭」為「及哀」的時間下限，似乎更合理。沈彤之說，恐怕不甚妥當。

杜預《注》云：

諸侯已上，既葬則縗麻除，無哭位，諒闇終喪。⁴⁰

孔穎達《疏》云：

昭十五年稱穆后崩，王既葬除喪，叔向曰：「三年之喪，雖貴遂服，禮也。案僖三十三年《傳》云：「卒哭而祔」，杜云：「既葬反虞，則免喪，故曰卒哭，哭止也。」如杜此言，則卒哭與葬相去未遠，同在一月。《儀禮》士三虞，則天子諸侯皆同於此。必知然者，以卒哭是葬之餘事，共在一月之中，故云既葬則衰麻除。或云既葬卒哭，衰麻除，以其相近故也。若據〈雜記〉云：「諸侯五月而葬，七月而卒哭」，中間既賧，或有國事，稱號云何？是知葬與卒哭相連，間無事也。然〈雜記〉云：「諸侯五月而葬，七月而卒哭」者，案《釋例》曰：「《禮記》後人所作，不與春秋同。」是杜不用也。既葬除喪，唯杜有此說，正以春秋之例，皆既葬成君，明葬是人君之大節也。昭

³⁸ 沈彤之說，詳見《清經解》，冊2，頁604。

³⁹ 見《清經解續編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88），冊3，頁23。

⁴⁰ 見《十三經注疏·左傳疏》，頁39。

十二年《傳》曰：「齊侯、衛侯、鄭伯如晉，晉侯享諸侯，子產相鄭伯，辭於享，請免喪而後聽命，晉人許之。禮也。」於時鄭有簡公之喪，未葬，故請免喪。其下《傳》又云：「六月葬鄭簡公」，丘明作《傳》，未嘗虛舉經文，而虛言此葬，得非終前免喪之言也？以此知諸侯既葬則負喪，喪服既除則無哭位，諸侯既然，知天子亦爾。《尚書》「高宗諒陰，三年不言。」《論語》云：「何必高宗，古之人皆然。」是天子諸侯除服之後，皆諒陰終喪也。《晉書·杜預傳》云：「太始十年元皇后崩，依漢魏舊制，既葬，帝及群臣皆除服，疑皇太子亦應除否？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。唯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，始服齊斬，既葬除喪服，諒闇以居，心喪終制，不與士庶同禮。於是盧欽、魏舒問預證據。預曰：『《春秋》晉侯享諸侯，子產相鄭伯，時簡公未葬，請免喪以聽命，君子謂之得禮。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，《傳》曰：弔生不及哀。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。書傳之說既多，學者未之思耳。喪服，諸侯為天子亦斬衰，豈可謂終服三年也？』預又作議曰：『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，既葬除喪而宴樂以早，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。稱高宗不言，喪服三年，而云：亮陰三年，此釋服心喪之文也。譏景王不譏其除喪，而譏其宴樂早，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。堯喪舜諒闇三年，故稱遏密八音。由此言之，天子居喪齊斬之制，菲杖經帶當遂其服，既葬而除，諒闇以終之三年，無改於父之道，故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。喪服既除，故更稱不言之美，明不復寢苫枕塊，以荒大政也。《禮記》云：三年之喪自天子達，又云：父子之喪，無貴賤一也。又云：端衰喪車皆無等。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制同於凡人。心喪之禮，終於三年，亦無服喪三年之文，天子之位至尊，萬幾之政至大，群臣之眾至廣，不得同之於凡人，故屈己以除之，而諒闇以終制。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。……』」杜《議》引《尚書傳》云：「亮，信也。陰，默也。為聽於冢宰，信默而不言。」鄭玄以諒闇為凶廬，杜所不用。⁴¹

按照孔穎達的理解，杜預認為天子諸侯三虞，與士無別。此說不但與《雜記》不同，也與許慎《五經異義》所錄古《春秋》左氏說迥異。彼謂天子九虞，共歷十七日，諸侯七虞，共歷十三日。間一日而行卒哭，則天子卒哭，在葬後第十九日，而諸侯卒哭則在葬後第十五日。士三虞，則葬後第七日即行卒哭之禮。⁴²據《雜記》，七月而卒哭，則卒哭與葬間有兩個月的時間，孔氏認為假如喪服還要拖長這麼一段長時間，將對日常事務造成影響。而且，按照杜預的想法，《禮記》不足以說春秋之制，即《雜記》所言不必與春秋實況相合。出於這個考慮，

⁴¹ 見《十三經注疏·左傳疏》，頁39。又杜預喪服議不見於《晉書》本傳，實出《志》第十，蓋孔氏誤記。說詳朱冠華《劉師培〈春秋左氏傳答問〉研究》（北京：光明日報，1998），頁231。

⁴² 許君《五經異義》文，詳黃永武《許慎之經學》，頁523。

杜氏就索性把天子諸侯卒哭的時間定為與葬日相連的那幾天。孔氏更引《左傳》所載周景王「既葬除喪」及鄭伯免喪之事為證。卒哭之後，就杜氏「短喪」之說而言，無須再行寢苦枕塊之禮，換句話說，可以脫下喪服（當然不用穿受服），換上平常穿的吉服。這裏牽涉到「高宗諒闇」的問題，杜預認為鄭玄解「諒闇」為「凶廬」不可從，於是別出新解，以「諒闇」為「信默」，即既葬之後，形式上不用服喪，然孝子思親之情不能就此中絕，於是就用「心喪」三年的方式，繼續為親服喪。

筆者認為，周景王「既葬除喪」，甚至舉行燕飲之禮，假如把「除喪」看成「受服」，這件事就不好理解。當時離太子及穆后之死不久，如果改穿受服的話，其受服必然也不會太輕。畢竟還是喪服，試問身穿喪服怎麼可以跟人家同飲共歡呢？《左傳》昭公十二年載晉侯饗鄭伯，鄭伯當時身穿喪服，不是也先「請免喪」嗎？杜預的說法顯然較為近理。「既葬除喪」，即葬好穆后之後，周景王就除下喪服，穿上吉服，只有這樣，才能夠與人宴飲。而且，叔向不譏周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太早，反映出當時社會上的人似乎也接受這種做法，起碼不斥為非禮。陳立《公羊義疏》在疏釋哀公六年「除景公之喪」的時候，綜合《左傳》與《公羊傳》的有關記載，分析這個問題說：

〈喪服〉斬衰章，「父」。《傳》曰：「父，至尊也。」又曰：「君」，《傳》曰：「君，至尊也。」則君父皆應三年，景公死於上年之九月，至此年秋末始及期，舍及陳乞，並諸大夫，皆無除喪之禮，蓋時無三年喪禮也。故《孟子·盡心》云：「齊宣王欲短喪。公孫丑曰：『為期之喪，猶愈於已乎！』」又〈滕文公篇〉，滕定公薨，然友反命，定為三年之喪，父兄百官皆不欲，曰：「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。」襄十四年《左傳》吳子諸樊既葬而除喪（引者按：此文有誤，《左傳》原文作「吳子諸樊既除喪」）《注》：「乘卒至此春十七月，既葬而除。」閔二年《傳》：「譏始不三年。」《論語·陽貨篇》宰我問三年之喪，期已久矣。是當時各國皆不行三年喪也。《詩·檜風·序》：「素冠，刺不能三年也。」則春秋前已有不三年者矣。⁴³

許多事例告訴我們，春秋時期，三年之喪確實不甚通行，時人服喪之年月多不合乎應有之數。杜預所說的「短喪」，很可以用來說明當時的一些情況。

「短喪」，在春秋時期來說，得到社會的認可，甚至還頗為流行，當然杜氏認為「既葬除喪」是春秋時期天子諸侯之達禮，也有武斷之嫌。再者，就虞與卒哭而言，春秋之時，天子與諸侯恐怕不必都用三虞之禮，而卒哭更不必就在既葬之後的一個月內。

⁴³ 見陳立《公羊義疏》，頁1929。

皮錫瑞《駁五經異義疏證》以為，《左傳》所載既葬除喪之事，皆不可信。他說：「《左氏》所載之事，多春秋衰世之事；《左氏》所言之禮，亦多當時通行之禮，本不盡與古禮合，杜氏藉以申其短喪之邪說，尤不可訓。」黃永武反駁皮氏說：「《左氏》與禮，相為表裏，苟舍春秋行事紀實之文而不顧，反取信乎秦漢儒者說禮之書，謂合古禮耶？」⁴⁴黃先生指出，《左傳》為紀實之文，此言確不可易。周何《春秋吉禮考辨》曾遍檢春秋行事紀實之文，陳列八證，確證當時天子諸侯之禮，既葬之後，於卒哭而祔之時，實有除服即吉以通變制宜之事。然猶持哀於心，故婚娶不行，諒闇三年，必待終喪而後全吉。⁴⁵

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檢視《穀梁傳》之說。《春秋》載魯桓公薨于十八年（694B.C.）夏四月；五月，公喪至自齊；十二月才得以下葬。至此年（693B.C.）秋，其葬已歷三季。魯莊公除衰麻之服已久。或如杜預所言，時莊公仍在諒闇之內，不便行全吉之禮，但當時莊公是否親自行禮，似乎也很難說。《穀梁傳》謂「衰麻，非所以接冠冕」，恐怕是揣測之詞，並非紀實之言。廖平根據《穀梁》「衰麻」之文而說：「公在大祥內，未出喪」。按禮，十三月而大祥。按廖平此說，當時莊公仍為其父服喪，「未出喪」即在喪期之內。「秋築王姬之館于外」，到底是秋七、八、九月的哪個月份，《春秋》經傳皆沒有明說。但即便以莊公之薨或其喪至魯始計，至此時（無論七、八、九月）已逾大祥之時。

總上所論，可知《穀梁傳》謂莊公仍服衰麻，蓋無的而放矢。毛奇齡《春秋毛氏傳》云：「《穀梁》胡氏謂縗麻不可接弁冕，則諸侯既葬，喪服除矣，尚縗麻乎？」⁴⁶此說確當，支持《穀梁傳》之說者恐怕難以辯駁。但毛氏所說的「公在憂次，不便行吉禮，接賓于廟，故築館于外」，卻也值得商榷。據《左傳》所記，春秋喪禮確有居喪之次，如僖公九年記晉「里克殺奚齊于次」，並釋《春秋》書法云：「書曰『殺其君之子』，未葬也。」⁴⁷魯莊公當時或確曾倚廬，但桓公葬已久矣，說莊公這個時候仍居喪次，亦難以自圓其說。

六、「為外」與「于外」文意有別

跟《公》、《穀》二傳不同的是，《左傳》就築館於外一事的評論極為簡略，只說「築公姬之館于外，為外，禮也。」《左傳》說「為外」，用字與經文不同。遍檢清代以前各家注疏，只找到孔穎達《疏》曾說「為之於外」，這句話似乎就是「為外」的注腳。細審孔氏文意，「為之於外」，大意是說為王姬築於外，很可能是暗用《穀梁傳》「為之築」之意。除此之外，未

⁴⁴ 皮錫瑞及黃永武之說，並見《許慎之經學》，頁529。

⁴⁵ 見周何《春秋吉禮考辨》（臺北：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，1970），頁242。

⁴⁶ 見毛奇齡《春秋毛氏傳》，《清經解》，冊一，頁589。

⁴⁷ 見楊伯峻《春秋左傳注》，頁329。

見注家對此作出直接的解說。爰及清代，于鬯及俞樾才注意到「為外」與經文「于外」用字不同，並為這兩個字提出了截然不同的釋讀。于鬯《香草校書》云：

此外字非上文築館于外之外。杜解謂得禮之變。而孔義因謂築之于外，是應變之禮。殆誤解矣。上文云：「不為親，禮也」，此云：「為外，禮也」，兩句相應。是此外字與上文親字為對，親指文姜，則外指王姬。文姜為魯大夫（引者按：當作夫人），是親也。王姬非魯女，是外也。因仇齊而不為文姜，是不為親也。所以為禮，不以仇齊而不為王姬，是為外也。亦所以為禮。若如孔義以此外即上文外字，則為外二字直可省矣。⁴⁸

于鬯認為，《左傳》說的「為外」，跟經文比較，「為」、「于」用字不同，兩個「外」字詞義亦異，注家把「為外」與「于外」混為一談，以致產生誤解。于氏把「為外，禮也」與前文的「絕，不為親，禮也」進行比照，認為「為親」與「為外」結構一致，互相照應，從而得出「親指文姜，外指王姬」的結論。于說得到現代注家如楊伯峻、陳戌國的認同。⁴⁹「外」作名詞用，指特定範圍以外的對象，《左傳》似有其例。⁵⁰但于氏似乎沒有考慮到，按照他這種想法，「不為親」與「為外」，同一「為」字，用法卻不同。前者，「為」作動詞用；後者，「為」作介詞用。「絕不為親」，楊伯峻譯為「絕母子之親」。「絕」指斷絕，「不為親」指不能成為親人。這樣說來，「不為親」的語法結構就是：否定副詞+動詞（為）+賓語。《春秋》莊公三十二年記：「春，城小穀」。《左傳》解釋說：「春，城小穀，為管仲也。」⁵¹這個「為」字的用法跟「築王姬之館于外，為外」一樣，皆作介詞用，分別與「管仲」、「外」組成介賓短語，表示「城小穀」與「築館于外」的原因。

至於俞樾《羣經評議卷二十五·春秋左傳一》則云：

按為猶于也。古于、為二字通用。《儀禮·士冠禮》曰：「宜之於假」，鄭注曰：「于，猶為也。」然則為亦猶于也。又〈聘禮·記〉曰：「賄在聘于賄」，注曰：「于讀曰為。」

⁴⁸ 見于鬯《香草校書》（北京：中華，1984），頁752。

⁴⁹ 見楊伯峻《春秋左傳注》，其文云：「此『外』字與上文『于外』之『外』不同。上條云『絕不為親，禮也』，此云『為外，禮也』，兩句相應。親指文姜，外指王姬。王姬非魯女，故云外。意謂為外女禮當築室於城外也。說詳于鬯《香草校書》。俞樾《古書疑義舉例》卷一謂『為外』即『于外』，不確。」（頁157-158）；陳戌國《春秋左傳校注》（長沙：岳麓書社，2006），頁87。

⁵⁰ 陳克炯《左傳詳解詞典》（鄭州：中州古籍，2004）解說「外」的這種用法說：「指特定範圍以外的對象。」舉例中，除築王姬之館于外外，還收錄另外一例。（頁290）

⁵¹ 有關這句話裏「為」字的用法，詳參何樂士《左傳虛詞研究》，頁345。

然則為亦可讀曰于也。「為外，禮也」，猶曰「于外，禮也」。蓋上句築王姬之館于外，乃是經文。《傳》舉經文而釋之，若但曰禮也，則疑若通言築之為得禮，而無以明築于外之為得禮，故疊于外二字，而曰于外禮也，為外即于外也。……正義曰：正為築之于外，是應變之禮。又曰：為之於外，是其得禮之變也。雖於傳義未失，然不知為外即于外，則古訓湮矣。⁵²

俞樾列舉文獻用例，證明「于」、「為」可以通用，並認為《傳》文特地重複「于外」二字，是考慮到若只說「禮也」就「無以明築于外之為得禮」。在古訓裏，于、為無疑可以通用，問題是，《左傳》話裏的這個「為」是否有必要改讀成「于」。我們只要把「築王姬之館于外，禮也」與「築王姬之館于外，于外，禮也」仔細比較一下，不難發現，像前面這樣寫，文意完具，已充分表明「築于外之為得禮」之意，亦符合《左傳》全書文例，反觀後面的寫法，重複「于外」二字，除了勉強說有所強調外，並沒能增加多少含意。

從整體來說，于鬯之說雖有不少疑點，但他不像其他學者那樣把「為外」與「于外」糾合在一起，而是把這兩句話分開釋讀，這種做法是可取的。正如他所說，若果「為外」的意思等同於「于外」，就不必重複，在《左傳》裏，我們確實也難以找到這樣解說經文的其他例子。筆者認為，「為外」當讀如字。《傳》文說「為外」，文例與「城小穀，為管仲也」類同。「為」用作介詞，「外」指外女（王姬），「為外」連言，說明築館於外的原因，合乎《左傳》解說經文的慣例。

七、論「築王姬館于外」為合禮及此館之所在

如上所述，《左傳》「為外」本意是說魯為王姬築館於外，是合禮的做法。這點，鄭玄早就看出。綜觀歷來對「築王姬之館于外」一事的解說，以時代先後論，當然以三《傳》最早，其次就是漢人的說法，其中鄭玄的看法最值我們重視。孔穎達《疏》錄鄭玄《箴膏肓》之文云：

宮廟、朝廷，各有定處，無所館天子之女，故宜築于宮外。⁵³

鄭玄所撰《箴膏肓》，針對何休《左氏膏肓》而發。依鄭氏此說，築王姬之館於外是本當如此，

⁵² 見《俞樾笥記五種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3），頁3a。

⁵³ 見《十三經注疏·左傳疏》，頁137。

合乎禮制的規定。或許如李源澄〈箴膏肓後評〉所言⁵⁴，何休曾執《公羊》築於外為非禮以難《左氏》，所以鄭玄申明《左氏》本意如此。陳戍國在引述于鬯之說後加按語說：「于氏對桓公元年傳兩處『禮也』作的解說頗為精當。又，依《左氏》的說法，『築王姬之館于外』，本來合符禮制，與當時『有喪制』、『恨齊』的特殊背景並無關係。孔疏引鄭君《箴膏肓》解釋《左氏》，倒也值得注意。」⁵⁵于說不可從，已見上述。陳先生指出，鄭玄的看法值得注意，這倒很有見地。

王紹蘭《周人春秋說》分析三《傳》及漢人有關「于外」之異說云：

左氏莊元年《傳》：「築王姬之館於外，為外，禮也。」孔《疏》云：「鄭《箴膏肓》云：『宮廟朝廷各有定處，無所館天子之女，故宜築于宮外。』是須築之意也。此言外者，謂城之外。說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者亦以為城外。然王姬來嫁必須築館，所以十一年王姬不築館者，或因其舊館，或築而不書也。」紹蘭按：鄭說左氏外為宮外，非城外。《穀梁傳》云：「築，禮也。于外，非禮也。築之為禮何也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，於廟則已尊；於寢則已卑。為之築，節矣。」范甯《注》云：「公門朝之外門，主王姬者常設筵于宗廟，以俟迎者，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。」是《穀梁》說當築於公門之內。公門之內即宮外，與鄭說《左氏》合。《公羊傳》：「築之，禮也。于外，非禮也。于外何以非禮？築于外，非禮也。其築之何？以禮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。於路寢則不可，小寢則嫌，群公子之舍則以卑矣。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。」何休《注》云：「禮，同姓本有主嫁女之道，必闕地于夫人之下、群公子之上也。時以將嫁女于讎國，故築于外。于，遠辭也。為營衛不固。」是公羊說當築於宮內。闕地在夫人之下、群公子之上。以于為遠辭，且云營衛不固，是謂左氏之外為城外，故鄭箴之為宮外也。《白虎通·嫁娶篇》：「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？昏禮貴和，不可相答，為傷君臣之義，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。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何？諸侯親迎入京師，當朝天子，為禮不兼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『築王姬觀于外』，明不往京師也。所以必更築觀者何？尊之也。不於路寢，路寢本所以行政處，非婦人之居也。小寢則嫌，群公子之舍則已卑矣。故必改築於城郭之內。」是班固用公羊說，而謂改築城郭之內，則又與何休築于夫人下、群公子上之說異矣。⁵⁶

王紹蘭分辨三《傳》及鄭玄、班固之說的異同，頗為明晰。文中引述班固《白虎通》之文，

⁵⁴ 見李源澄〈箴膏肓後評〉，《學術世界》，第二卷三期，1937年，頁48。

⁵⁵ 見《春秋左傳校注》，頁87。

⁵⁶ 見王紹蘭《經說》（台北：新文豐，1984），頁282。

說明班固對築王姬之館於外的理解。⁵⁷班固這裏明確指明王姬之館的所在，即在城郭之內，他還引《公羊傳》之文⁵⁸，說明「于外」即城郭之外。由此可見，除了合禮與否外，對「于外」的理解，班固與鄭玄也持不同的意見，班固謂在城郭之外，而鄭玄則說在宮外。楊伯峻《春秋左傳注》也談到王姬館之所在，他說：

于外者，孔《疏》引鄭玄《箴膏肓》云：「宮廟、朝廷各有定處，無所館天子之女，故宜築于宮外。」是以「外」為宮外。然昭元年《傳》云：「楚公子圍聘於鄭，且娶於公孫段氏，伍舉為介。將入館，鄭人惡之，使行人子羽與之言，乃館於外。」《注》云「舍城外」，則是單言「外」者，謂城外也。故孔《疏》亦謂此為城外。⁵⁹

楊先生贊成「城外」說，並舉公子圍之事為證。筆者認為，這種看法不能成立。

首先，公子圍聘鄭，行的是聘禮，同時也為了迎接新婦。所謂「將入館」，大概與〈聘禮〉「致館」相當，不同的是，這裏似乎是楚人自致。按當時「君行師從，卿行旅從」的習慣，⁶⁰公子圍此行，隨從人員眾多，鄭人恐其趁機入侵，多次婉拒楚人入城，就連親迎於祖廟的大禮，也不讓舉行，只是「除地為墀」，草草了事。可見這裏的「館於外」確實是館於城外。但單憑這個「外」，就斷定「築王姬館于外」之「外」為城外，未免太過武斷了。

事實上，無論按照聘禮或親迎之禮，鄭人都不應該阻止楚人入城。按《儀禮·聘禮》，賓入所聘國都城後，遂「至於朝」，鄭玄說是「賓至外門」，「外門」為國君外朝之門，即庫門。然後由所聘國下大夫引導賓客入朝，向國君告至。下大夫遂又帥賓，至於館舍，賓既至館，國君又使卿來「致館」。其所致之館，〈記〉云：「卿館於大夫，大夫館於士，士館於工商」，鄭《注》云：「館者必於廟，不館於敵者之廟，為太尊也。」這說明了賓館於比其身份低一級的大夫的廟寢。這個館舍應離宮宮不遠。這裏就一直是賓下榻的地方，到了賓將行之前日，國君仍親到這兒來拜訪聘賓，這就是〈聘禮〉所說的「公館賓」。⁶¹據《左傳》所載，春秋之時，諸侯確設有客館招待朝聘賓客，如僖公三十三年，「鄭穆公使視客館」；襄公三十一年，鄭子產相鄭伯朝晉，盡壞其館，並力陳「崇大諸侯之館」的道理，於是晉平公「乃築諸侯之館」。此鄭、晉二國設館的確證。魯國情況如何，雖未見載籍，但應與他國無異。由此可見，

⁵⁷ 「館」，《白虎通》作「觀」，洪亮吉謂「觀、館，古字通。」見《春秋左傳詁》（北京：中華，1987），頁22。

⁵⁸ 《白虎通》文，見陳立《白虎通疏證》（北京：中華，1994），頁479-480。

⁵⁹ 見《春秋左傳注》，頁157。于鬯之說，詳見《香草校書》，頁752。

⁶⁰ 《左傳》定公四年載衛子魚曰：「君行師從，卿行旅從」，杜預注「師」云：「二千五百人」，注旅云：「五百人」。見《春秋左傳注》，頁1535。

⁶¹ 參考謝德瑩《儀禮聘禮儀節研究》（臺北：文史哲，1983），頁104、399。

外國卿大夫來聘，所聘國尚且為之設館於都城之內，而謂館王姬於城外，這種待遇豈非連侯國卿大夫也不如？且既在城外，則「營衛不固」，如何備禦不虞呢？揆之情理，必無其事。可見，《春秋》這個「外」字，不能作城外解，否則《左傳》所謂「禮也」，也就無著落了。

至於築王姬之館於公門之內或宮內，似乎也說不過去。據任啟運《朝廟宮室考》，天子諸侯皆有三朝，包括：外朝、治朝、燕朝。諸侯之宮有三門：1.庫門，即外門；2.雉門，即中門；3.路門，即寢門。外朝在廟門之內，治朝在雉門之內，燕朝在路門內（燕寢及正寢）。⁶²王姬身份如此尊貴，恐怕不能把她安置在路門之內。就是築在內朝或外朝之內，也會阻礙朝政的正常運作。比較適合的地方，似乎是在公宮之外，城郭之內⁶³，鄭玄說的「宜築于宮外」，也就是這個意思。

八、結論

我們知道，三《傳》解經，方式不同，《左傳》以史傳經，間亦解說書法，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則專說筆法大義。就「築王姬之館于外」而言，《左傳》所言最為顯括，不作鑿空之論；《公羊》所論，旨在說明當築於內、於外為非禮；《穀梁》則多方設想，探尋經旨，其立意最為深曲。⁶⁴廖平主張「會通三《傳》」，究其實質，無非以《穀梁》通釋二《傳》。抑有甚者，廖平雖主《穀梁》，但其所言，顯然脫離文本，純從虛處立論。只要細心思辨，就不難發現其說疑點重重，欠缺說服力。總而言之，廖說實有求之過深之嫌，立說雖巧，而終不足信。今天看來，我們對廖平的「獨造之學」似乎有重新探討的必要。

根據上文的論述，也許我們給《左傳》找到一個合理的釋讀。「築王姬之館于外，為外，禮也」，「為外」當讀如字，文例與「城小穀，為管仲也」類同，「為」皆作介詞用，這裏的「外」指外女（王姬）。「為外」，不過是用以說明築館於外的原因罷了。而經文「于外」所指涉的範圍，大概就在公宮之外、城郭之內。陳戍國《先秦禮制研究》說：「《左傳》記載王姬下嫁，由同姓魯國主其婚事。『築王姬之館於外』，而不在魯國都城安排王姬住宿，據說正適合彼此身分，因而被認為『禮』也。」⁶⁵陳先生此說，除以「外」為城外仍有可商外，基本上符合《左傳》的原意。由是而知，對「築王姬之館于外」的評論，不僅《左傳》與《穀梁》所說不同，

⁶² 見《清經解續編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88），冊1，頁761。又參看《春秋左傳注》，頁263。

⁶³ 有關魯都城及宮城的規制，參看曲英杰《先秦都城復原研究》（哈爾濱：黑龍江人民，1991），頁260。

⁶⁴ 李崇遠《春秋三傳傳禮異同考要》（臺北：嘉新水泥文化基金會，1969）評論三《傳》之異同得失云：「今案《春秋》王姬之歸，書之最備者，齊王姬也，書之備者，所以見莊公之盡禮於仇讎，而無恩於先君也，罪之大，則書之備，惡之積，不可掩也。築王姬館于外，左氏謂其為外，禮也。此誤也。從公、穀說為宜。」（頁181）是《公》、《穀》而非《左氏》，未可從。

⁶⁵ 見陳戍國《先秦禮制研究》（長沙：湖南教育，1991），頁353。

就是《公羊》與《穀梁》亦不盡相合。李源澄認為，「《左氏》文略，其義不顯；《穀梁》則詳」⁶⁶，鄭玄亦宜引證其說。《穀梁》所言，最為可疑，已具論如上，李氏或未深考，故誤信其說。⁶⁷李耀仙以為，自東漢馬融的《三傳異同說》至傳隸樸的《春秋三傳比義》，「雖將《三傳》匯集起來，俱是『異者自異，同者自同』，尚非於不同中求同。廖平所作的『會同』工作成效如何，自有客觀評價，但他這種探索新道路的精神畢竟是可取的。」⁶⁸就「築王姬之館于外」而言，廖平的「會同」工作看來不太成功。筆者認為，把三《傳》分開來看，不必強為混同，才是實事求是的做法。當然，廖平這種「探索新道路的精神」確實是值得肯定的。

⁶⁶ 見李源澄〈箴膏肓後評〉，《學術世界》，二卷三期，1937年，頁48。

⁶⁷ 傳隸樸《春秋三傳比義》云：「按經文於王姬之事，都是據事直書，如『夏單伯送王姬』、『秋築王姬之館』、『冬王姬歸于齊』，並無褒貶之筆，……《穀梁》好為深論，往往越深越謬，真所謂愚而好自用者。」（頁201-202）此言甚是。但傳先生以為「三《傳》相較，當以《公羊》為明確。」說似未安。

⁶⁸ 李耀仙《梅堂述儒》，頁386。